



■ 葛守昆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員

一、充分认识消费人类经济增长永恒的动力

经济自消费始。人类最初的经济活动主要从消费开始，人类最终的经济目的也从消费结束。可是非常遗憾，这样一个几乎属于常识性但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问题并未被经济学家们和经济决策部门所重视，消费对于经济的目的性在许多场合被遗忘或淡化。其实，在遥远的古代社会，人类祖先就是为了消费的满足才脱离动物界，用劳动生产更多的消费品来解决温饱不足的问题，从而有了最初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和再生产消费品的环节不断延伸，既包括消费品本身的生产，还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甚至还连接着许多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有了商品生产和交换，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货币成为了交换的媒介，货币代表了商品的价值，成了经济财富的象征。以至于人类经济活动离消费渐行渐远，许多经济活动似乎与消费关系不是十分密切，甚至出现偏离、远离、背离消费的情形。当然，在微观层面上，就个人和企业而言，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驱动，通过消费品或非消费品的生产，追求货币财富的增加也属天经地义。问题是在宏观层面上（主要是国家层面，全球层面更是如此），货币特别是纸币，主要是一种价值符号，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并不构成经济的真正目的。如果全社会经济活动脱离消费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或者以货币为中心，以追逐货币为目的，

人类经济发展势必违背原来的初衷，其经济增长的目的性就值得怀疑。

以生产消费品为目的的经济为什么要增长？在根本上，则是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也是增长的，撇开人口增长的因素，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消费品的数量特别是质量需求是不断增加的，包括消费品的升级换代和消费品范围的扩展。所以，消费是经济永恒的增长动力。当然，消费品的生产要涉及到众多的生产与再生产环节，围绕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需要有生产消费品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生产消费品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还有其它为人类消费提供的生产环节，比如，安全的生产、环境的生产等。必须指出，只有以消费为中心构成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那些脱离、远离、偏离、背离消费，游离于消费之外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构成真正的经济增长，只能是一种为生产而生产、为投资而投资、为速度而速度的增长。这样的增长很可能是一种典型的物质浪费，是虚增实减。

二、积极发挥消费需求对“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在经济增长问题上，人们都知道消费、投资、出口对速度有拉动效应，是“三驾马车”。问题是“三驾马车”之间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投资、出口必须与消费相匹配。从实践来看，我们过去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投资和出口的贡献。2001年到201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速度在20%以上，出口年均增长速度也在20%左右，但与消费密切相关的居民收入年均增长不到

以消费为基础促进经济增长

近年来，中央为了扩大内需，在多次会议上都提出了要“发挥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我以为，这既是对前些年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也回归到了人类经济增长的规律性目的。以消费为基础促进经济增长，核心是围绕居民的消费需求组织经济活动，保证经济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实现经济稳定健康增长。

10%，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只在35%左右。反映了投资与出口脱离消费而成了脱缰的“野马”。其实，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虽然会明显带来企业利润的增长、税收以及财政收入的增长、就业的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形成较高的速度，但如果投资远离消费，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如能否形成生产能力，或有了产出有否市场需求，亦或有市场需求是否能收回投资并有回报？近年来，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也反映了固定资产投资存在的问题，表明投资与消费之间未能形成密切的关联效应。出口也是如此。在经济学意义上，出口是国家之间贸易的互通有无、填补空缺，核心是为了进口，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生产高品质的消费品，或者直接进口高品质的消费品，提升国民的消费水平。脱离进口，特别是消费需求，为了出口而出口，可能毫无意义而没有价值。

特别需要指出，中国是人口超级大国，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必须始终确立以消费为中心组织经济增长的理念，打破为生产而生产、为投资而投资，为出口而出口的增长传统。将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在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方面，注重消费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居民消费质量以及消费对于社会发展的进步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标准。当然，也必须看到，尽管居民消费始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并不意

味着居民消费本身的增长越快越好。一般来说，人类在解决温饱、生活实施初步完善以后，消费的增长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或基本饱和的阶段。这时候，主要追求消费的品质、安全、环境和健康等因素，消费表现出科学合理而富于理性。尤其是在没有大的消费升级和更新换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片面追求过高的消费品零售增长，以此带动经济增长，也不是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为什么西方有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并非是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处于相对饱和的状态，不会有大的增长。

三、围绕消费需求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认为，以消费为中心促进经济增长，核心是从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和难点消费问题入手，大力发展与提升消费品质密切相关的产业，并以这类产业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1、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为突破口，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食品工业

近些年来，从出现三聚氰胺“毒奶粉”后，不断出现“毒大米”、“毒猪肉”、“毒香肠”、苏丹红、地沟油等，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搞得人心惶惶、无所适从、无可奈何，在相当程度上，是将人们一下子从发展状态退回到生存状态，这也给中国的经济增长敲起了警钟。现在，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呼声很高，是现代农业和现代食品工业发展的大好时机。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走出多年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发展老路，充分认识农业不仅有“稳”的功劳，同样可以有“富”的贡献。关键是告别传统的小农经济、小商品、小生产方式，通过规模经营、集约经营，农工贸、产加销相结合，走特色化、高效化、标准化、安全化的路子，提高农产品质量，促进安全消费。

2、围绕建设良好生态环境目标，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在经历了工业化中后期以后，环境在经济增长中上升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消费层面上，环境成为了重要的和基本的消费品。比如，对清洁空气的需求、对干净水的需求，是消费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只是钱多了、房子大了，但生活在雾霾状态，会大大降低消费的质量。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矛盾，构成了

对环保产业的巨大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环保产业发展的重要契机。必须围绕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大力发展与此相关的环保产业，比如环保设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绿色生态产业、空气洁净产业、废品回收和利用产业等，形成向环保产业发展要经济增长速度的增长机制。

3、迎接老年化社会的加速来临，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

我国老年化社会正在加速来临，今后一段时期，由老年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将日益凸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不断满足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有利于拉动消费和促进经济增长。应加快以老年生活照料、老年产品用品、老年健康服务、老年体育健身、老年文化娱乐、老年金融服务、老年旅游等为主的养老服务业全面发展，保持整个经济增长形成“稳中求进”的基本态势。

4、突出消费质量的提升，加快健康产业

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人们在告别“短缺经济”、解决温饱问题以后，对健康的需求就成为了重要的消费需求，也进入了健康产业大发展的时代。健康产业在我国也是一个新兴产业，有很大的经济增长空间。要积极发展涉及医药用品、保健食品、保健用品、绿色食品、体育健身用品、体育健身场所、心理咨询和疏导、医疗康复以及为人们身心健康息息相关的各个生产和服务行业，将健康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

5、落实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科技产业有大的发展

提升消费品质的经济增长，对科技创新有强烈的需求。但是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的发展本身又有着很高的要求，难度较大。关键在经济增长的指导思想上，要走出投资依赖和外资依赖的增长模式，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发展的路子。特别是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突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科技劳动者的权利，保护发明创造和知识产权，鼓励科技人员办科技型企业，坚持以科技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消费的需求。

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

■ 江春泽

（上接 01 版）
我个人也有个思想解放的过程（见《猜想与求证》后记）。1990年，当我接受领导交办的任务，写一个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的材料时，我就考虑，怎样有说服力地消除市场经济恐惧症和对计划经济的顶礼膜拜。我采取的方法是，把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政治性争论“软化”、“轻化”，把它还原为只不过是一个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争论。那个材料经体改委作为“绝密件”上报后“通了天”，获得了肯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效果。这本书是那个材料的深化与扩展。可以说，这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是为了消除“市场经济恐惧症”，同时，所展现的历史事实也能雄辩地消除对计划经济的理论误解。

第一篇，讲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消除商品、货币、市场，全社会是一个大工厂，人们在自由人联合体里按计划进行生产和分配的预言，与当时的生产力有关。他们逝世后，技术革命浪潮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值得思考和研究。我在本书后记中对此略有思考。我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地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这方面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第二篇，讲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实践，不断地修正自己原先的认识，不断地变动经济体制。到后来，他自己终于说“根本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他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作用，认识到商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整个链条的“中心环节”，是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他大胆地提出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并不断地根据新经验深化和扩展“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列宁在逝世前甚至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新经济政策”之“新”就“新”在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新”在强调利用市场机制，“新”在给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并要求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新”在尽可能以经济手段取代行政手段。它第一次在实践中造就了一个重视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如果沿着列宁这样的思想路线走下去，苏联有可能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经济体制模式。可惜，由于列宁的早逝，他的探索成果被斯大林完全抛弃了。



第三篇，讲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党内发生了关于继续执行还是终止“新经济政策”的激烈争辩。如果当时是布哈林的理论政策主张占了上风，新经济政策继续执行，就有可能发展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布哈林早期因反对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加入“左派共产主义者”行列，著有《共产主义ABC》和《过渡时期经济》，这都是他早期的“左”倾观点，我们党内老一辈的革命家、理论家是从这些著作了解他的。对他后来的主张并不了解。实际上，布哈林是共产党领导人中关于市场经济的先知先觉者。列宁曾称赞他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新经济政策有很高的悟性。他非常清楚地阐明了通过市场道路、通过工农业同时繁荣来建设社会主义，当时的反对派曾经给他扣过一顶帽子，就是“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新经济政策分子”。斯大林曾经倚仗布哈林的理论打败了托洛斯基的极“左”反对派，当时，斯大林在与托洛斯基争论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胜利时，曾经正确地说“一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条件就是执行新经济政策”。但后来在联共党内第二场斗

争中，斯大林却拾起托洛斯基的观点，批判布哈林，压制和封锁了他的意见，没有把他的政策主张交给中央委员会集体讨论，只武断地把“阶级斗争熄灭论”、“花纱布社会主义”等帽子强加于他，把他清除出党，最后甚至罗织罪名把他枪毙了。现在，我们再看看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论述，他讲得何其正确！如果那时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允许不同意见发表，允许对不同的建设路线和政策主张展开充分讨论，允许布哈林的意见在局部地区进行试验，经过实践检验再统一思想，作出决策，苏联的命运也许会被完全改写了。斯大林处决了布哈林以后，大权独揽，钦定《联共（布）党史教程》，把“新经济政策”定调为暂时的退却，条件具备时再“进攻”，随后在1929年强力推行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块。从此，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成了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效法的样板。我在书中第三篇的述评结论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历史的弯路。

第四篇、第五篇是反思中国走过来的路。毛泽东从正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到长期

以“左”的指导思想变革生产关系，我在述评中简单总结了几点主要的经验教训。邓小平从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到破解计划与市场的世纪难题，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书中我着重记述的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些传统观念逐个突破的那瞬间发生的故事。读者可以看到，好不容易突破了一点，但还有反复、还有新的局限性。比如，十二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突破是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反反复复做了多少工作啊！走出这一步已经非常艰难，可是，商品经济并不等于市场经济，更何况人们对这一提法可以各取所需，有人强调“有计划”，有人强调“商品经济”，以至后来还是争论不断。分歧的总根源还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有盲区。1992年，邓小平公开明确地宣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才确定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目标模式。自那以后，我们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国家综合实力增强，都是不争的事实，但直到现在，仍然有人要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死死地捆绑在一起，仍然把市场关在计划的笼子里。其实，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一点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它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所在。

第三，加深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完整认识和深入研究。

关于市场经济的效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早有生动的描述，说资产阶级在它统治不到100年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全部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也熟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中的结论：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频繁的经济危机，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中的萧条景况令人毛骨悚然。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恐惧主要来源于此。正是这场大危机促使了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我在本书后记中提到了当时的情况。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是深刻的。各国生产倒退几十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人口由1000万增加到4500万，其中，美国的失业人口由150万增加到1300万，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5%。“大萧条”的时间跨5个年度。“大萧条”导致货币体系崩溃，美国银行全面瘫痪，这在危机史上是第一次。由此，自由市场经济的传统理论中“管得最少的

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受到挑战。当时，英国保守党的丘吉尔政府仍然坚持传统经济理念，而美国共和党的胡佛政府则无所作为，被称为“袖手旁观”的政府。这时，纽约州长、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挺身而出，发表演说，许诺将实行包括复兴、救济、改革的“新政”以挽救国家。他说：“国家需要大胆而持续的实验。”随后，他在就职演说中更坚定地鼓舞士气，说“大可不必害怕坦诚面对我们国家今日所处的情况”，说“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充满信心，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建立起国家广泛参与的新型的现代市场经济。从此，美国开始了“大转型的时代”。

转型后的现代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区别就是加入了政府“有形之手”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或称调节（Coordinate），他们不说“调控”（Control），政府只在“市场失灵”的场合下发挥作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市场功能与政府功能的边界怎样合适，也是西方经济学领域永恒的争论主题。随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了。

我们经济体制转型的目标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自发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作用是题中应有之义。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内在各环节有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体系，它要以行为主体良好的信用为前提，行为主体的行为要以法律为准绳，要以金融监管为保证，要有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为安全阀，要有合理的税制既鼓励劳动和创新，又防止财富过度集中，要倡导公益基金会为依托的捐助文化，关注社会的长远发展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引导社会财富的良性循环，等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市场体系也是逐渐修补、逐渐完备的。毕竟，这种转型有半个多世纪了，积累了经验，我们要借鉴一切有益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开展比较研究，进一步突破一些僵化的观念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深化改革，逐步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化建设尽快地完善起来。

上面，我讲了讲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和书的大体内容，以及刚刚读到那位老经济学家的文章之后的感想。一句话，改革正未有穷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经济关系的争论还没有终止。这个问题只有在理论上搞清楚了，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才能劈风斩浪，扬帆前进。

（本文是作者6月14日在其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首发式上的致辞）（完）